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治理的变迁

刘彦武

**【摘要】**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是国际经验与本土路径的有机结合,贯穿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文化善治是中国文化治理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现文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纵观新时期文化治理变革经历了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治理空间由内及外、治理方式从人治到法治、治理路径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为进一步改善新时期中国文化治理,必须辩证地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文化民主与文化集中的关系、国家文化利益、社会文化利益与公民文化利益的关系、国内文化治理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关系。在政府—市场—社会治理机构中,实现多元使命互动,追求多元主体共赢,促进多元利益和谐。

**【关键词】** 文化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善治;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6)07-0147-8

随着党和政府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廓清认识与逐步掌握,人们觉察到我国对文化管理、调控、规制发生着一些若隐若现的渐进性变化。这些变化来自于文化治理理念的确立与影响。本文拟从主体、空间、方式、路径等角度,考察近年来我国文化治理变革的主要路线,并力图对影响文化治理能力的几对关系作出初步的概括。

## 一、文化治理的中国特色

文化治理是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而逐步明晰起来的。作为国家“五位一体”治理体系之一,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该重大命题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文化领域必须回答的重要课

题。尽管在中央文献还没有出现过“文化治理”这一表述,但在文化部以及个别地方的表态中已经有这些提法。<sup>[1]</sup>在这些政治语境与现实述求影响下,文化治理问题开始受到大陆学界的集中关注。但从已有文献研究看,有学者评价“文化治理”更像学科研究中的一个论述用语或工具;<sup>[2]</sup>也有学者主张慎用“文化治理”这个概念,因为它隐含着权力的“文化霸权”问题。<sup>[3]</sup>因而很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对“文化治理”加以审视。

据俞可平考证,“治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这个表述。<sup>[4]</sup>此后,便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流行术语。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治理”概念备受学界和政界青睐。新世纪

**【基金项目】** 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校级一般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治理的变迁”(项目编号:SCJD2016YB02)成果。

**【作者简介】** 刘彦武,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教授,《党政研究》常务副主编,四川 成都 610017。

“治理”又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经历了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现在的文化学等领域的话语扩散和学术旅行。早先,国内常用“公司治理”或“公司治理结构”来讨论公司转型和企业改制。现在,“政府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等一直是政治学者的口头禅。从党的报告也可看出,十六大政治报告、十七大政治报告文本中“治理”出现的频次也就三四次,包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人治理结构”等初步蕴含西方“治理”理念的用语,但从十八大政治报告以及后来的三中、四中全会报告文本看,“治理”出现频次在一二十次以上,出现了“全球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基层治理”“第三方治理”等学术新词。当然,“治理”作为本土词汇本身也有统治、管理的含义,比如治理国家。据《现代汉语词典》,“治理”还有处理、整修的解释,比如,治理黄河、治理淮河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动词来界定的,与来自西方学术术语“治理”是有区别的。西方社会的“治理”是指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管理机制。与传统的“统治”有两个方面的区别。首先,统治的权威必定是政府,而治理的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统治的主体是政府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政府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比统治概念更加宽泛,统治只用于政府,而治理还可以用在公司、学校以及基层社区。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统治总是单向度的,自上而下,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而治理的权力向度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sup>[5]</sup>

把治理引入到文化领域,台湾地区要早于大陆。王志弘等人主要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福柯的“治理术”以及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来进行理论建构的,他们将文化治理界定为,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与经济(及各种社会生活面向)

之调节与争议,透过各种程序、技术、组织、知识、论述和行动等操作机制而构成的场域。反观大陆学者,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论述文化治理,屈指可数。郭玲凤从公共管理角度把它界定为一种网络。而胡惠林则从文化发展和文化管理的技术或实务层面对文化治理加以阐释。吴理财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论述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sup>[6]</sup>2014年国家行政学院、首都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与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的“硬管理”不同,文化治理更多的是一种“软管理”,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将国家文化治理纳入市场化、法治化、人性化的轨道中。<sup>[7]</sup>这些界定或偏向于西方治理理论,或侧重于文化管理实务,或从综合全面考察,我们认为,国家文化治理理论是国家或政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关于文化治理模式、结构、功能、性质的总规定和总概括。考察新时期我国文化治理必须从历史高度,把国家文化治理置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国家战略布局的现实条件下,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架构中,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唯如此,文化治理理论之树才会常青。

首先,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必须是国际经验与本土路径的有机结合。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也是基于我国文化长期传承、渐进性发展、内生性深化的结果。文化发展不是孤立的,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奥秘,但是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交锋从没有停止。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是文化开放的总基调,但对于外来文明成果,我们必须采取扬弃政策,从我国实际出发,在批判和否弃其错误的东西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和吸收其合理的东西。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sup>[8]</sup>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多元化、法治化、民主化和协商

性、过程性,借鉴这些经验一定要坚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与我们党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开放长期积蓄起来的文化经验相衔接,必须与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一致。否则,文化发展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驶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即使再繁荣也是文化治理的失败,因为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企业有明晰的管理边界,而我国的公共文化事务不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它还承担着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

其次,文化治理贯穿文化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当代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和社会生活整体变迁的历史。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依次逐步展开。从文艺院团“双轨制”到国有文化单位改制,从事业产业分治到文化跨界融合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治理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向来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场景和重大叙事。每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每次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例外地包括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有时是一段文字,有时是一节内容,甚至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发展,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化治理始终纳入到党和政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纳入到各项体制改革整体部署中,并作为文化发展的动力引擎的高度来谋划。

再次,文化善治是文化治理的价值目标。治理是作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补充而提出来的,它不能代替政府,也不能代替市场。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效而成为恶治的可能性。因此,追求善治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那么,文化善治也应成为文化治理的价值追求。文化善治的过程就是实现文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

管理过程,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方向不能迷失;其二,有严明的法度,以法治文,依规治文;其三,治理成本低,行政效率高,文化服务质量好;其四,社会参与度高,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充分释放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创造活力,在惠民安民中乐民,在娱乐他人过程中娱乐自己。如何实现文化善治?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文化治理方式规范化、文化治理对象分类化、文化治理理念兼容化、文化治理机制系统化。<sup>[9]</sup>

最后,文化治理是技术层面的考量。治理涉及机制、程序、策略等“治理术”层面,可以为我所用:政府有责任采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文化进行控制和引导。包括:视文化治理为一个过程,而非只是制定一套僵硬的政策、法规了事;文化治理吸纳社会力量作为参与方,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只有政府文化机构;文化治理参与方式是公开透明而非暗箱操作;文化治理的策略是民主协商而非管控,是持续的互动而非单向度的强制;文化治理的手段不再是单一的行政命令,还可以是市场激励机制、财税补贴、规制调控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综上,我们这样来界定新时期中国文化治理,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发展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而吸纳多方共同参与、采用治理新手段的文化管理新机制,包括文化治理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 二、文化治理变革的主要路线

纵观新时期文化治理变革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路线图: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治理空间由内及外,治理方式从人治到法治,治理路径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

其一,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据俞可平分析,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从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一元治理格局,转型到以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类企事

业单位和各种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治理的格局,其中党和政府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党主要负责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则主要负责行政责任。<sup>[10]</sup>与此相应,我国新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也经历着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的变迁,党委、政府、社会、市场、个体等都共同参与文化治理。从治理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前的文化体制,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文化体制基础上的,是主要参考苏联模式的,是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匹配的大一统的体制,治理主体单一化是这个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我国的逐步确立,文化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协调。1980年代,文化市场地位得到正式承受,文化单位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化解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同时实行了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改革措施。1990年代,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社会力量逐步纳入到文化治理体系中来。到了新世纪,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文化志愿者也在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中成为新生力量。时至今日,我国文化治理逐步建立起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从治理理论来看,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变迁也得到了元治理理论和协调治理理论的支撑。

元治理(metagovernance):就是作为“治理的治理”。该理论最早由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杰索普提出,“元治理”是对治理理论的修正和完善,旨在对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重新组合治理机制。“元治理”,强调国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杰索普指出:“虽然治理机制可能获得了特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职能,但国家(政府)还是要保留自己对治理机制开启、关

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sup>[11]</sup>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核多元”治理主体结构是保证各方文化利益最大化的关键。“一核”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核心,是保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流砥柱。在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中,领导力量不丧失。“多元”包括政府是主导力量,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是关键依托,民营文化企业是重要支撑,社会组织是能动力量,人民群众是坚实基础。这样的治理主体结构与元治理理论相契合。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实现各方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有效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

协同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既存的法律法规为共同规范,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广泛参与、平等协商、通力合作和共同行动,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方式的总和。协同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如今已成为许多国家政府治道变革的路径选择。从全球范围看,协同治理是政府治理绩效不彰、公民社会不断壮大、公民民主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等背景下的产物。<sup>[12]</sup>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基层民主改革带来人民民主参与意识以及权益保护意识增强,民营文化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在文化资源的配置、文化利益的增加的过程中,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诉求日益强烈,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急需由传统的单向权力向上下、左右互动的协商治理模式转变。作为文化治理主体结构中的多元各方,只有通过广泛参与、平等协商、通力合作和共同行动等协同治理,才能实现文化利益的最大化。

其二,治理空间由内及外。伴随着国家在治理行为与治理方式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化治理空间架构也逐渐由体制内到体制外,治理范围也由小及大。这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从管脚下到管天下的变革。2003年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

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脚下到管天下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让非公经济与此同台竞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文化经济快速崛起,有的省市民营文化企业力量占到文化经济总量的大半河山,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格局。二是从内循环到跨界融合。在过去的文化运行机制下,很多文化事务成为游离于社会公众生活之外的自娱自乐的“自闭文化”,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多在文化系统内循环。<sup>[13]</sup>近年来,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三者关系重新建构的过程中,这些弊端正得到消除。一方面,出台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把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文化系统的“内循环”转变为市场的“大循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用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树立“文化+”的融合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更好地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为扩大国内需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三是从纵轴来看,中央-地方-基层这三个层面文化治理的自主性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在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系列改革过程中,中央加大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成为了改革的关键和中轴变量:既是中央政策的传声筒和执行者,又是基层需求的感应器,地方政府成为了中央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双重代理人。而基层治理的大胆探索,其自主性、能动性和行动力得到激活,国家文化治理在不触及根本政治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能够获得既有体制空间的拓展和体制效能的最大化释放,从而带来了从中央到地方在治理绩效方面的全方位提升,进而也给体制空间本身的转换和突破赢得了可能。<sup>[14]</sup>四是从横轴来看,国家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坚持求同存异,保护文化多样性,讲好中国故事;主动参与到世界文

化竞争与发展格局中,通过孔子学院、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国文化年等形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其三,治理方式从人治到法治。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从人治到法治转换的过程,一个逐步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又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理念日益在党政机关人员和人民群众心头清晰起来。2010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sup>[15]</sup>具体到文化领域,过去那种仅靠红头文件、行政手段的管理方式逐渐向行政、法律、经济多种手段结合管理的方式转变。当然,文化法律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立法,意识形态属性强,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仅要处理好发展与管理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内管理规定与国际通行惯例的关系,依法治文、依规治文还做得不够好,同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文化法治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立法数量少、立法层级低、立法质量有待提高。<sup>[16]</sup>当前,要加快法律制度供给,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增强文化治理的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

其四,治理路径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管制的成分日益减少,服务的比重在日益增

多。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首次把“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的基本职能。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确认为政府的目标。<sup>[17]</sup>俞可平认为,服务政府包括五个方面内容:强调政府服务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完善公共服务的各种法规政策,为服务政府提供制度保障;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在文化领域,建设服务政府一要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这是政府责任。保障人民大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中西部地区,农村基层,边远山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文化资源薄弱,这是建设文化小康的短板,政府要加大文化投入,统筹区域、城乡、群体之间文化发展。保障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城市贫困户等弱势群体享受文化低保,也是政府兜底责任。二要增加文化供给能力,改变过去单一的计划手段,发挥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三要提高文化供给水平,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四要改善文化供给方式,山区、牧区因地制宜,采取文化大篷车、乌兰牧骑等流动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随着人们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因时制宜,增加文化服务网络化、移动数字化方式,方便人们及时快捷获取。此外,公布政府权力负面清单,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推行“一站式”办公,缩短审批时间,减少行政成本,建设高效、廉洁、透明政府,等等,这也是文化治理路径重要变化。

### 三、改善文化治理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行进中的中国文化治理发展着、演变着,有

收获,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实现文化善治,达到文化利益最大化是政府、社会、市场各方的价值追求。为进一步改善新时期中国文化治理,必须从辩证的角度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顶天立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在现行政治制度框架下,我国文化治理采取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上下要求一般粗,加之中央地方分灶吃饭,“责任地方化、义务基层化”<sup>[18]</sup>现象突出。如果基层对中央的顶层设计研究不够、琢磨不透,只知道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缺乏创新,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化发展难有所成。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对那些制约我国文化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必须进行顶层设计,注重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事权与财权相协调的原则,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文化事务的范围,划分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sup>[19]</sup>其实,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创新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做到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历史地看,基层创新一直在丰富着国家治理的经验,“自下而上”地推动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革。<sup>[20]</sup>一是解决基层探索动力不足、勇气不够的问题,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比如,在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过程中,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试点。二是积极为基层创新提供法律授权、制度支持和政治保护,宽容基层探索中的试错,允许基层创新中的失败。三是由于治理结构的层级差异与地域差异,不能强求文化治理的全国同步性,也不能强求中央和地方的同步性。要正确处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着眼于坚守共同底线,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第二,收放自如:文化民主与文化集中的关系。由于传统文化管理中缺少治理的多元化、法治化、民主化和协商性、过程性等元素,文化集中多,文化民主少;文化灌输多,文化协商少。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社区书屋、农家书屋,图书供给与图

书借阅存在供需结构上的不合理、信息上的不对称,重一次性配置,轻过程性管理,发挥作用不显著。因此,要以文化民生和文化项目为突破口,进一步拓宽公民参与文化治理的渠道,完善社会多元参与文化治理的平台,建立健全公共文化决策民意调研、社会征询、专家论证、公示听证制度。现代社会,资讯发达,人民有更加方便快捷的如微信、微博等多种参与民主的方式,重大公共文化决策应多倾听专家意见,多尊重国有民营文化企业、社会组织、文化志愿者、广大群众的意愿,同时要着力解决“沉默的多数”意见被忽略与少数人通过自媒体和互联网操控舆论误导决策的问题。<sup>[21]</sup>中国的文化治理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建设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文化治理局面。文艺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艺。发扬文化民主,尊重人民的多种选择,同时必须结合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提高他们,以符合文化发展方向与文化发展战略。比如,广场舞是人民群众的一种文化自觉活动,是文化民主与文化集中相统一的典型案例,政府通过文化志愿者辅导以及开展各种比赛奖励,提升活动水平;通过环境法规约束,减少活动噪声扰民的负效应,实现与周边居民和谐相处,在自娱中娱人,中国大妈广场舞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城乡重要的文化景观。

第三,多方共赢:国家文化利益、社会文化利益与公民文化利益的关系。改善文化治理,必须妥善处理好三者关系,清晰界定国家文化利益、社会文化利益和公民文化利益的基本范畴,实现利益主体地位平等,保障多元利益共赢。国家文化利益,从国际来看,主要是保护文化多样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保持在国际文化发展与竞争中应有的话语权力。从国内来看,国家文化利益是政府文化部门通过公共权力发展文化、传承文化、保护公民文化权益从而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精神力量。政府要把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与公

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保护协调起来,超然于市场之外,既不与民争利,也不破坏游戏规则,而是维护好市场规则。既不能为了公民个人文化利益而损害国家文化利益,也不能无视个体文化权利的基础而建设空中楼阁般的国家文化利益,因为国家文化利益是基于维护公民基本文化权利而存在的利益。社会文化利益是市场参与主体、文化治理参与主体各方的文化利益。由于文化经济的特殊性,我国文化治理强调强调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非决定先作用,同时并不否定或忽视政府作用,一方面要规范政府的垄断行为,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要逐步推出,另一方面又要治理好市场竞争的失灵,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做社会利益博弈的“平衡器”,促进社会信息透明,使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充分的信息交换中了解彼此的利益、立场,从而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避免社会各阶层因利益冲突而损害治理协作。公民个人文化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逻辑起点。在当代中国公民文化权利虽然深入人心,人们的文化权益的维护意识也开始兴盛,但是保护公民文化权益的体制机制尚未得到彻底贯彻。文化救济权成为公民文化保障权的重要内容,是公民文化权益受到侵犯后的法律救济与援助。古人云:“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sup>[22]</sup>总之,通过多元治理方式,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sup>[23]</sup>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多方共赢。

第四,内外兼修:国内文化治理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关系。有专家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来探讨。<sup>[24]</sup>国内文化治理是全球文化治理之本,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增加它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领导力作用,反过来,在国际上更多话语权又能促进国内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彰显中国领导人的全球视野和政治智慧。近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亚投行、“一带一

路”建设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尝试。依葫芦画瓢,中国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一方面要积极主动争取在国际文化组织中的话语权,增大中国声音,另一方面,倡导建立以中国为主、吸纳多方的世界文化机构,通过这些管道和实际项目,参与

到全球文化治理中去,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统筹兼顾国际国内两个文化治理,实现多元使命互动,追求多元主体共赢,促进多元利益和谐。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文化部:五方面着力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03/c\_118826353.htm;2016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为“十三五”开好局[EB/OL].河南文化网,http://www.hawh.cn/whzx/2016-01/22/content\_238047.htm;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四川日报,2016-02-15.
- [2] 陈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视域[J].文化艺术研究,2014,(3).
- [3] 大力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J].探索与争鸣,2014,(5).
- [4] [5]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 [6] 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 [7] 大力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J].探索与争鸣,2014,(5).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44.
- [9] 林坚.文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EB/OL].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http://nads.ruc.edu.cn/displaynews.php?id=2687
- [10]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 [11] 丁冬汉.从“元治理”理论视角构建服务型政府[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 [12] 刘伟忠.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研究[D].山东大学,2012.
- [13] 大力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J].探索与争鸣,2014,(5).
- [14] 张晨.转型视野中的地方治理:空间转换、体制重塑与绩效评价转向[D].苏州大学,2014.
- [15] 吴邦国: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10/2895683.shtml
- [16] 王晓晖.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A].《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C].人民出版社,2014.201.
- [17]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 [18] 王浦劬.论我国基层治理权力与责任体制机制的优化[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1).
- [19] 傅才武,宋文玉.创新我国文化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及政策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 [20] 胡薇.理解地方治理现代化的五个维度[N].学习时报,2015-11-30.
- [21] 蓝蔚青.在权责清单下政府职权的三维配置优化[J].党政研究,2016,(1).
- [22] 张礼恒.何启 胡礼恒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42.
- [23] 吴德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探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4,(2).
- [24] 宋才发.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标识的法制探讨[J].党政研究,2016,(1).

(责任编辑 翟 琨)



## Huangdi Culture and Yellow River Culture

*Guangchun Xu*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um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created by mankind. Huangdi culture should be in Huangdi times, is the sum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which was created by Huangdi and citizens led by Huangdi's family.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is a broad concept, including all the practice and results of transformations of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being, including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broad area of politics, economy, ecology, military, ideology,

culture,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so on, including all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harvest from imperial princes, leaders to general population.

**Key words:** culture, Huangdi culture, Yellow River culture.

**Personal profile:** *Guangchun Xu*, Former Secretary of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Zhengzhou, Henan, 450003.

## Compare of Three Pairs of Concept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Structure Theories

*Zhihong Fang*

**Abstract:** In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heori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has always been emphatically studied. Different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heories, often talking about common topic, i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comparab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heories. Compar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ory of Narratology with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structure theory, we can find that the conceptions of "core function", "sequence", and "deep structure" are correspond to "main mind", "block",

"program", both of them express the common topic in different words. To the compare of the both, not only can help us in-depth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structure theories, but also be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rrative theory.

**Key words:** narrative structure; compare concepts; Chinese Narratology.

**Personal profile:** *Zhihong Fang*, associated professor,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Governanc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Yanwu Liu*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Governance is governance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must be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local route,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ultural reform. Cultural Kind Governance is the value objective of Chinese Cultural Governance, is the management process to achieve maximizing the cultur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new period, cultural governance reform has experienced governance subject

centralized to pluralism, governance space from inside to outside, governance method from ruling from man to ruling from law, governance path from control-oriented government to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Chinese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period, should dialectical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grassroots innovation, cultural democracy and cultural focus, national cultural interests,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ests and cultural interests of citizens, domestic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government - market -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achieve the interaction in the multi-missions, the pursuit of win-win multiple subjects, to promote harmony of multiple interests.

**Key words:** governance, cultur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Personal profile:** Yanwu Liu, professor, Party School for Sichu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610017.

---

## From the Ease to Uniform: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urt Painting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ith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Concept

*Shen-grong Sang, Geng-yuan Wei*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ursuit of "Entertainment" of literary conception in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Court Painting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herited heedlessness aesthetic style. However, because of changes of the governance thought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conception gradually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With written records" With emphasis on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This kind of literary concept of "With written records", gradually affect

painting, then, Ming Court Paintings abandoned Yuan painting's desolate and cold replete, consciously chose the generational return, formed the painting style from the ease and the uniform.

**Key words:**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ourt Paintings; Ease; Uniform

**Personal profile:** Sheng-rong Sang, lecturer, Peihua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eng-yuan Wei, professor,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